

多学科学术讲座丛书

27

中国现代文学及《野草》
《故事新编》的争鸣

王 瑶 李何林 著

多学科学术讲座丛书

27

中国现代文学及
《野草》《故事新编》的争鸣

王 瑶 李何林 著

知 识 出 版 社

上 海

责任编辑：陈荣乐

多学科学术讲座丛书

27

中国现代文学及《野草》《故事新编》的争鸣

王 瑶 李何林 著

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沪 版)

(上海古北路 650 号 邮政编码: 200335)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8 插页 4 字数 143,000

1990 年 6 月第 1 版 199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ISBN7-5015-5342-4/I·5

定价: 2.55 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由我国著名作家王瑶、李何林合著。其中“中国现代文学”为王瑶教授所著,“《野草》《故事新编》的争鸣”为李何林教授所著。

“中国现代文学”包括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特点、起讫时间、与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以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历史和现状 5 个论题。此文着重对中国现代文学史这门学科作出总体性的论述,通过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些重要现象和某些作家、作品,阐述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些基本问题。作者深入讨论了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外文学传统的继承、借鉴和创新,意在通过历史经验的总结,阐明中国现代文学总的发展特点和规律。

《野草》和《故事新编》,是鲁迅著作中比较难懂和有分歧意见的作品。它关系到鲁迅前期思想的性质问题和后期思想与创作的关系问题,也是对鲁迅一生的评价问题。本文摆出了十多年来争鸣中各种分歧以及作者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可以启发和帮助读者研究和解决这些难点,从而正确理解这两部最难读懂的作品。

作者职务

王 瑶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
《中国现代文学丛刊》主编

李何林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全国文联委员
中国作家协会顾问
北京鲁迅博物馆顾问
中国鲁迅研究会顾问

序 言

(第 三 辑)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在1983年暑期举办了第一期“多学科学术讲座”以来,在1984年和1985年又连续举办了第二期和第三期“多学科学术讲座”。1983年讲座的讲稿,除千家驹的《中国经济问题》,由于我国经济实际发展变化很大,作者提出不宜出版原讲稿而决定停印外,其余8种即将出齐。1984年讲座的讲稿亦正努力集稿出版中。为了保持编号连续性,决定将1986年八九月准备进行的《中国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战略问题》的讲座讲稿编入第一辑,替代千家驹的《中国经济问题》。

1985年的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多学科学术讲座”共9讲,除委托大连市民盟市委在大连举办的《化学化工的若干新进展》外,其余8讲都在暑期中假北京师范大学校园内举行。共有:(1)苏步青、谷超豪《微分几何在近代的发展》,(2)萧纪美《材料科学与工程的方法论》,(3)赵敏光《晶体场理论及其应用》,(4)于学夔《岩石力学新论及其在采矿及地下工程的应用》,(5)章文才《现代果树生产技术》,(6)潘大逵《比较宪法》,(7)王瑶、李何林《中国现代文学及〈野草〉〈故事新编〉的争鸣》,(8)吴富恒等的《西方文学》。这些讲

稿将编入“多学科学术讲座丛书”第三辑，由知识出版社(沪)陆续出版，与第一、第二辑连续编号。

这次讲座的主讲教授极大多数都是民盟盟员，苏步青教授又是民盟中央副主席，潘大逵教授是民盟四川省委主席，他们都是年逾八十高龄的老盟员、我国知名学者和教育家，他们毕生从事某一学科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他们仍然负担着繁忙的社会政治活动，象潘大逵教授还亲自上台讲授，而且写出了讲稿，为我国现代化作出贡献。

这次大连讲座，是一种新的形式。主讲教授们以集体的形式，总结报告了各自在化学化工方面的近期新贡献和综合报道了这些学科的重大国际发展，这是近年来在国际上风行一时的一种工作会议(WORKSHOP)形式。这对推动科学技术发展，和促进社会学术界重视社会经济某一重大新课题的探讨，特别重要。这对我国在开放和改革政策下推动学术界的工作结合祖国两个文明建设是不可缺少的。

1986年的多学科学术讲座现已初步决定采用工作会议的形式，由民盟中央直接组织名称为《中国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战略问题》的讲座，参加者将有费孝通、陶大镛、钱伟长、冯之浚、吴明瑜等人。其讲稿亦将编入讲座丛书第一辑，代替原定的千家驹《中国经济问题》。

中共中央的领导同志曾多次在各种场合，肯定中国民主同盟除了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党派外，也是一个拥有大量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的多学科智力集团，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条件，以多学科学术讲座的形式，为党中央的开放和改革政策，为祖国的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献计献策，对许多综合性的多学科的各种社会、经济、文化、科技、管理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活跃思想，来体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社会主义学术领导体制的优越性。

中国民主同盟近年来损失了不少老前辈的领导人和知名的专

家学者,如史良、胡愈之、华罗庚、朱光潜、张文祐等,朱光潜同志曾参加了1983年的讲座,张文祐同志原定1984年11月讲,后因病延期至1985年3月,但不幸于1985年2月11日逝世,华罗庚同志原定于1986年讲,也不幸于1985年逝世于日本讲台上而未果。我们痛失盟友,不胜哀悼。盟内尚有大量年事已高的知名学者教授,我们这个讲台,是为这些老盟友提供的,也是为了抢救我国的智力财富而设立的。

“多学科学术讲座丛书”,将如实记载这一努力。

钱 伟 长

1986年5月26日于上海

目 录

中国现代文学·····	王 瑶(1)
一、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特点·····	(1)
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起讫时间问题·····	(15)
三、中国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	(31)
四、中国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	(57)
五、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历史和现状·····	(74)
《野草》《故事新编》的争鸣·····	李何林(87)
一、关于《野草》的争鸣·····	(88)
二、关于《故事新编》的争鸣·····	(140)

中国现代文学

王 瑤

一、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特点

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中国社会内部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条件下，广泛接受外国文学影响而形成的新的文学。它不仅用现代语言表现现代的科学民主思想，而且在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上都对传统文学进行了革新，建立了话剧、新诗、现代小说、散文诗、杂文等新的文学体裁；在叙述角度、抒情方式、描写手段及结构组成上，都有新的创造，具有现代化的特点，从而与世界文学潮流相一致，成为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发端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早在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随着帝国主义侵略所造成的民族危机日益加重，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即在西方新思潮、新文学的启迪下，产生了改革文学以唤起民族觉醒的启蒙要求，在理论、诗歌、小说、戏剧、散文各个领域进行了文学改良的初步尝试，为“五四”文学革命作了思想与文学上的准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随着中国新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发展，中国社会新的民主势力——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力量有了很大发展。十月革命又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带来民族解放的新希望。在这样的经济、政治、思想背景下，触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这一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突破口，“五四”文学革命以反对封

建蒙昧主义与专制主义的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为主要旗帜,向封建旧文学展开了猛烈进攻,锋芒所及,从内容到形式,无不引起巨大的变革,开始了文学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这个新的文学运动,发轫于北京、上海等少数文化发达的城市,在中国现代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深入全国各地;在日本统治下的台湾省和以后沦为日本殖民地的东北地区以及香港、澳门等地,也都发生了并且进行着同样的或者类似的文学变革。

中国现代文学在“五四”文学革命以后的60多年发展过程中,随着中国革命与社会性质的演变,以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转折,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与社会主义时期两个历史阶段。这两个阶段的文学,既有各自的历史面貌,显示出不同阶段的差异性,又具有共同的传统与特点,存在着内在的连续性。新民主主义文学中所孕育的社会主义因素,保证了文学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到新中国成立后便形成了社会主义文学的洪流。这使两个阶段的文学具有下述共同的基本特征:

(一)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是人民的文学

“五四”文学革命在中国文学史上引起的历史性变革,集中地表现为大大加强了文学与人民群众的结合,文学与进步的社会思潮及民族解放、人民革命运动的自觉联系。这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特点与传统。“五四”文学革命由倡导白话文开始,就体现了文学必须能为最广大的群众所接受的历史要求。文学革命的先驱者提出了“国民文学”、“平民文学”的口号,以表现普通人民生活、改造民族性格和社会人生为文学的根本任务。在创作实践上,出现了中国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彻底反封建的新的主题和人物:普通农民与下层人民,以及具有民主倾向的新式知识分子。他们取代了旧文学中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成为文学的主人公;展示

了“批判封建旧道德、旧传统、旧制度”、“表现下层人民的不幸”、“改造国民性”与“争取个性解放”等全新的主题。

“五四”以后，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力量登上政治舞台，并在社会生活中日益显示出自己的力量。与历史的这一发展相适应，20年代中后期起在文学上提出了以“农工大众”为主要服务对象与表现对象的要求。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以后，更明确规定以大众化作为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中心。在创作实践上，进行了从正面表现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群众斗争和塑造觉醒中的工人、农民形象的艺术尝试；知识分子题材的作品得到新的开掘；从知识分子与人民、革命的关系这一角度，探讨与展示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指出了个性解放与社会解放相结合的道路。这一时期的革命作家与进步作家还作了文学形式通俗化、大众化的实验，显示了文学与人民相结合的新进展。

在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危难使作家与人民有了共同的命运，推动着许多曾经有过脱离人民的倾向，“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走出个人小天地。“文章下乡、文章入伍”成为抗战初期不同政治艺术倾向的作家们的共同要求。在抗战中期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中，文学与人民的关系，作家与人民的关系成为理论家和作家关注、思考的中心。在创作实践上，爱国主义成为文学的重大主题。作家们热情地表现伟大民族解放战争中新人的诞生和新的民族精神面貌的形成；抗战中后期，又转向对现实与历史的深入思考，着力于暴露破坏抗战、阻碍民族进步的现实黑暗势力，进一步探索民族传统文化与传统性格的优劣得失，充分显示了作家对于国家、民族强烈的责任感，和与祖国、人民休戚与共的血肉关系。民族解放战争也带来了文学形式的新变化：抗战初期小型、通俗作品的大量出现，中后期长篇小说、多幕剧、长篇叙事诗的繁荣，都促进了文学艺术与人民群众和时代的更密切的结合。

1942年，在革命根据地建立了人民政权的新的历史条件下，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鲜明地提出了“文艺为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大众服务”的根本方向，在深入工农兵火热斗争实践中，锻炼出一支熟悉工农兵生活并在思想感情上与工农兵打成一片的新型文艺队伍；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大众，特别是从他们中间成长起来的新人，成为文学的主要描写对象与歌颂对象；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和他们的语言受到了作家们高度的重视，并得到创造性的运用；新文学作品开始为普通工农兵群众所接受，新文学自身与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大众之间的关系，得到了空前的加强，为文学向社会主义方向的发展准备了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人民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国家的主人，这为文学与人民在更大的广度与深度上的结合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作家获得了深入工农兵和表现工农兵的自由及各种物质上的保证。随着人民文化科学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不仅充分享有欣赏文学艺术作品的权利，而且从直接参加体力劳动的工农群众中不断涌现出有文学才能的专业和业余作者。社会主义祖国的统一和团结，促进了各兄弟民族文学的发展。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先后有为数众多的少数民族作家参加了新文学的创造，如老舍(满族)、沈从文(苗族)、纳·赛音朝克图(蒙古族)、穆塔里夫(维吾尔族)、李乔(彝族)、李准(蒙古族)、玛拉沁夫(蒙古族)、饶阶巴桑(藏族)、陆地(壮族)、金哲(朝鲜族)、晓雪(白族)、康朗甩(傣族)等，现代文学成为多民族的文学，获得了更广泛的群众基础。热情歌颂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兵群众在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所建立的功绩，塑造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英雄形象，在50、60年代的新中国形成了强大的文学潮流，给文学的题材、主题、艺术表现方法与形式、风格，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1979年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解放思想、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

主义服务”的方向。作家自觉地与党和人民一起思考,探索振兴中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文学主题的演变和现实的发展取得了基本相同的步调;描写时代风云中普通人的历史命运和人生道路,展示“四化”建设中的时代英雄——改革者丰富的精神世界,塑造各种各样人物的典型形象,成为许多作家共同的艺术追求。作品题材趋向多样化的发展;除传统的农村题材继续受到一些作家的重视,并获得新的表现角度外,知识分子题材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工业题材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和平时期的军事题材有了新的开拓;历史题材的作品出现了初步繁荣的局面。文学作品在各阶层人民群众中引起的强烈反响,显示了文学与时代、人民之间的紧密而广泛的结合。

(二)中国现代文学是以革命现实主义为主体 并含有多种创作方法和流派的文学

“五四”文学革命在中国文学史上引起的另一个历史性变革,是大大加强了文学与现实生活的联系。打破“瞒”与“骗”的封建文学原则和方法,按照生活本来面貌反映现实生活,揭示现代中国社会真实的矛盾运动,以激发人民群众变革现实的热情;这一历史要求贯串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全过程,使革命现实主义成为现代文学文艺观和创作方法的主流。“五四”文学革命在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把“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作为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之一^①;以后鲁迅又进一步提出了“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②“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③的严格的现实主义要求。这一时期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提倡,充满着反封建传统的批判精神,强调了文学清醒地揭露和批判黑暗现实的功能,显示了启蒙主义的特色。“五四”时代是一个历史的开放时期,先驱者以恢阔的气魄,进行了多种创作方法与艺术流派的开拓。鲁迅和他所支持的文学研究会等社团的

作家，在开创中国现代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同时，又汲取了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艺术流派的某些艺术手法，为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鲁迅的短篇小说集《呐喊》、《彷徨》达到了代表时代、民族思想艺术的高峰，《阿Q正传》等作品，不但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之作，对许多作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引起了国际文坛的注目，成为中国现代文学进入世界文学之林的代表作。与鲁迅同时出现了叶圣陶、冰心、朱自清等一批各具特色的作家，也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以郭沫若、郁达夫为代表的创造社，以闻一多、徐志摩为代表的新月社，以田汉为代表的南国社等社团的作家，主要从浪漫主义文学汲取艺术营养，同时也受到西方现代主义不同程度的影响；《女神》、《沉沦》等作品开创了现代文学浪漫主义的传统。

20年代末与30年代，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得到了有力的倡导与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向文学的现实主义提出了加强与工农大众实际生活的联系，自觉地揭示历史发展趋向、表现无产阶级理想等要求，并有了“新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理论的介绍与提倡。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在自己的历史发展中面临着全新的课题：如何把无产阶级的思想要求即倾向性，与作品的艺术真实性的要求统一起来；如何认识与解决无产阶级文学必须表现工农兵的历史要求与作家对工农生活不熟悉之间的矛盾。革命文艺界为从理论与艺术实践上解决这一历史课题作了巨大的努力，同时也产生过某些理论上的失误与背离现实主义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创作倾向。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正是在不断克服自身错误的过程中日趋成熟，在创作实践上有了新的突破，在30年代产生了茅盾《子夜》这样里程碑式的作品，出现了巴金、老舍、曹禺、丁玲、张天翼、沙汀、艾芜、吴组湘、李劫人、叶紫、萧红、萧军、殷夫、蒲风、艾青、臧克家、夏衍等一大批有着鲜明艺术个性的革命现实主义作家。他们都以具有反映现实的深度、艺术上比较成熟的力作，为

现实主义艺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沈从文、戴望舒、施蛰存、何其芳等作家各自为汲取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等艺术养料,发展多种艺术流派,进行了多方面的艺术探讨,其理论与艺术实践的得与失,都为现代文学丰富多样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进一步加强了作家与现实生活的联系,推动了各种流派、各种创作方法的作家向革命现实主义归依的趋向,反过来又促进了革命现实主义向反映现实的深度、广度与多样化方向的发展。艾青、田间及七月诗派的诗歌创作,茅盾、巴金、沙汀、老舍、路翎的小说以及曹禺、夏衍、陈白尘、宋之的、吴祖光的戏剧创作,代表着这一时期革命现实主义艺术所达到的新的水平。郭沫若以《屈原》为代表的历史剧创作则是继《女神》以后革命浪漫主义艺术的另一高峰。

同一时期,革命根据地的作家长期深入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参加实际斗争,初步解决了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所面临的表现工农兵的历史要求与作家不熟悉工农生活之间的矛盾,获得了创作上的新成就。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等作品,在表现工农兵、并努力达到鲜明的思想倾向性与艺术真实性的统一上,为社会主义时期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经验。贺敬之、丁毅的《白毛女》等作品则显示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结合的趋向。

新中国成立所带来的巨大历史变革,为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生活基础。新中国的作家坚持真实地、历史地、在现实的变革和发展中反映生活,自觉地把革命现实主义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最根本的创作原则与方法,经过长期的艺术实践,在50、60年代逐渐形成了代表社会主义新中国文学的主导性风格与特征,即注重题材、主题的重大性与时代性,自觉追求具有“巨大

的思想深度”与“广阔的历史内容”的史诗性，对民族性格进行具有历史纵深度的开掘，创造雄浑壮阔的艺术境界，以及从历史进程中所汲取的昂扬的战斗精神。思想上艺术上的这些特点，在《红旗谱》、《创业史》、《红岩》、《茶馆》等优秀作品中，都表现得相当鲜明和突出。尽管这一时期的文学在多样性发展上有所不足，并存在着某些粉饰现实的偏差，但具有中国民族特色及时代特色的主导性风格的初步形成，无疑表现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日见成熟的趋向。

十年内乱中政治生活的逆转，人为地遏止了正在发展着的上述文学趋势，粉饰和歪曲现实的文学逆流的泛滥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经过拨乱反正的艰苦努力，文学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得到了恢复与发展。这一时期文学的主要特征是：题材的广阔性，揭露生活矛盾的深刻性与塑造人物性格的丰富性。社会主义文学的批判职能与歌颂职能得到了辩证的统一。作家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揭露与鞭挞阻碍民族振兴的腐败消极的事物和现象，歌颂和赞美振兴中华、建设四化的伟大事业中新的思想感情和新的人物。作家倾心于人物内心世界的开掘，努力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写出人物思想性格的复杂性、丰富性与独特性，在历史的纵深运动中揭示人物思想性格形成的根源及发展趋向；乔光朴（蒋子龙：《乔厂长上任》）、陈奂生（高晓声：《陈奂生上城》、《陈奂生转业》）、陆文婷（湛容：《人到中年》）等艺术形象的成功塑造，就显示出了作家们的这种追求，表现了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深化。王蒙等一批作家还以“拿来主义”的态度，从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等多种流派中汲取艺术养料，多方面地进行了富有创造性的探索，以丰富、发展革命现实主义的艺术表现力。作品的表现手法、艺术形式也有了新的开拓，充分显示了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生命活力。

(三)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是吸收外来文学营养使之民族化、继承民族传统使之现代化的过程

中国是一个有悠久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近代中国又受到西方文化的巨大冲击；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于这一文化背景下，如何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外来文化，直接关系到现代文学的发展。现代文学在发展初期，为打破抱残守缺的国粹主义的思想统治，进行文学的彻底革新，曾对西方各个历史时期的文艺思潮、文学流派，包括各种文学形式、表现手法，作了全面介绍与广泛吸收，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学遗产进行了重新评价。这对打碎封建旧思想、旧文学的枷锁，促进思想与艺术的解放，促进文学的现代化，起了重大作用。中国现代文学的伟大奠基者鲁迅曾经指出，中国现代小说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的要求的，一方面则是受了西洋文学的影响”^④，他自己开始进行创作时所仰仗的也“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⑤。但由于中国现代作家自身与中国人民生活，特别是与民族解放、人民革命运动的天然联系，对民族心理、习俗、语言的熟悉，以及中国传统文学的修养等原因，外来文化必然经过有意识地借鉴、汲取、消化的过程，逐步实现民族化。中国现代文学各个领域的早期开拓者，无论是小说领域的鲁迅、郁达夫、叶圣陶，诗歌领域的郭沫若、闻一多，散文领域的周作人、朱自清、冰心，戏剧领域的田汉、洪深，他们的创作几乎是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了现代化与民族化兼而有之的特征。与此同时，作为发展过程中的历史现象，也曾经出现过对西方文化与传统文学都缺乏分析的形式主义偏向，一部分作家提出了在文化（包括文学）上“全盘西化”的错误主张，一些创作存在着脱离群众、脱离民族传统的“欧化”倾向。

20年代末、3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进一步传入及其与中国文艺运动实践结合的结果，产生了中